



天鹅绒

中华锦绣

赵丰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
华
书
局

2008-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天 鹅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绒 / 赵丰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12
(中华锦绣/赵丰主编)
ISBN 978-7-81137-923-5

I. ①天… II. ①赵… III. ①天鹅绒 - 介绍 - 中国
IV. ①TS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8458 号

中 华 锦 绣 • 天 鹅 绒

著 者	赵 丰
责任编辑	王晓丹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 9.5 字数 126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923-5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皆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绣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200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著《中国丝绸通史》,在一些丝绸老专家的提议下,总编辑吴培华邀我担任主编。此书在全国的丝绸历史专家及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正式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大奖。此后,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提出在《中国丝绸通史》的基础上再出一套简明而轻巧的普及版,于是,我们又策划、编写了这套“中华锦绣”丛书。

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至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十段,依照年代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

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生产历史、传统工艺、主要种类、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前后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缂丝、吴地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顾绣、浙南夹缬,并荣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2011年,我们推出了第二辑,分别是浙罗、天鹅绒、蜀锦、黎锦、宋锦、蓝印花布、和田艾德莱斯以及吴绫。

“中华锦绣”丛书和《中国丝绸通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丝绸通史》的编写中,我们是以考古发现或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的;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注重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

在2008—2009年中,“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地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蚕桑丝织就是中华锦绣的同义词,就是中国纺织染绣的代表作,就是中国丝绸文明和纺织文化的象征物。由此,我们藉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建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

赵 丰

前言

在为本书定名时,我心中一直有些迟疑不决。天鹅绒织物在纺织品种分类中是一个统一的名词,英文中称为 velvet^[1],但在中国却一直被称为漳绒和漳缎,它们分别代表着天鹅绒中的两个品种大类,却不能包括所有的绒类织物。与此同时,天鹅绒在苏州只是对某一类雕花漳缎的称呼,比漳绒的范围更小。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并无一个较为合适的词来统领所有的绒类织物。同时,漳绒和漳缎中的“漳”字,是个地名,因为其最初产于漳州而得名,而事实上,漳州现在已经不产天鹅绒,天鹅绒的主产地是江苏的南京、苏州一带。考虑到多种因素,最后我决定还是把本书的书名定为天鹅绒,一则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对绒织物的称呼,二是迄今为止,除苏州之外,它还可以与 velvet 的总类对译,可以同时代表漳绒和漳缎两个大类。

关于中国天鹅绒的研究,国外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对于中国古代绒织物的研究以加拿大的柏恩汉(D. Burnham)所做工作最为详细。柏恩汉曾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简称 ROM)的纺织品研究员,于1958年对该馆

[1] Vocabulary of Technical Terms, Fabrics. Publications de CIETA, Lyon, 2006.

所藏明代绒地刺绣龙袍袍料作了仔细的研究,并于 1959 年出版了《中国绒织物的技术研究》一书〔1〕。书中主要就明代在东方和中国生活的西方商人及传教士的记录,对当时绒织物的生产和历史作了考证,并对其技术特点进行了归纳,明确了同一时期东方天鹅绒和西方天鹅绒的技术区别。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 1592 年 11 月 15 日从广东韶州写给他父亲的信中提到的“只是在最近几年,当地一直在生产天鹅绒,并已做得非常不错”,柏恩汉得出结论,中国的起绒织物要到 16 世纪 90 年代后才开始生产。另外,在比较了大量中国传世的明代绒织物与西班牙同一时期绒织物后,柏恩汉又认为,中国的绒织物生产技术来源于西班牙。

至今为止,柏恩汉的这一观点在西方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很多学者据此来区别明代西方收藏中的中国产天鹅绒。近年,又有日本的吉田雅子在探寻中国出土丝织品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绒织物,并据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部分成果发表于《中国绒的形成:基于地方志上用语变迁的研究》和《庆长遣欧使带回的祭服》两篇文章中〔2〕。

与此相比,中国国内的同类研究起步稍晚。20 世纪 60 年代,定陵孝靖后棺内出土物中有两件由双面绒织物制成的女衣,一件是黄双面绒绣龙方补方领女夹衣(J82:2),另一件是红双面绒绣龙凤方补方领女夹衣(J90:3)。两件双面绒夹衣色彩不一,但结构相同,它们

〔1〕 Harold B. Burnham. Chinese velvet, Occasional Paper 2, Art and Archaeology Division,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9.

〔2〕 吉田雅子:《中国におけるベルベットの形成——地方志等における用語の变迁を通して》,帝冢山短期大学织物文化研究会会志《はた》1998 年,第 5 号,第 35~47 页;《庆长遣欧使节请来的祭服に关して》,东京国立博物馆 Museum,1998 年第 552 号,第 57~75 页。

的出土,引起了文物界和纺织史界的极大关注。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刘柏茂和罗瑞林对这两件双面绒夹衣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它们以平纹地为基本组织,绒经作V形固结,双面均有剪绒,并认为由双面起毛杆一上一下起绒织成〔1〕。1982年,赵承泽先生发表《关于我国古代起绒丝织物的几个问题》,主要从文字考证的角度讨论了几个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明代绒织物的问题〔2〕。后来,赵承泽先生又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中深化了对这一研究的阐述〔3〕。1985年,包铭新发表《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这是一篇以文物分析为主并结合史料的讨论明清绒织物的论文,所论不仅包括绒类织物,而且还包括丝毯等生产技术,文后附有织物分析表,包铭新在文中也曾对定陵出土双面绒的织造方法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可能是用结合了双层起绒法和杆织法的工艺生产的〔4〕。这几篇文章尽管讨论的主题和范围不同,但有一点共识是:中国自己发明了绒的织造方法,而且早于1592年。

我对中国起绒织物的关注开始于1999年。当时,我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基金并赴该馆进行客座研究,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古代绒织物。在那里,我开始较为系统地检阅明代史料中与绒织物生产相关的内容,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一一分析了该

〔1〕 刘柏茂、罗瑞林:《明定陵出土的纺织品》,载《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351页。

〔2〕 赵承泽:《关于我国古代起绒丝织物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技术史组主编《科技史文集》(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86~92页。

〔3〕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第八章第三节“起绒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63页。

〔4〕 包铭新:《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丝绸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21~29页。

馆藏的几十件中国起绒织物,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国外的起绒织物进行了比较研究,初步梳理了中国天鹅绒的起源、发展和技术特点,初步写成了《明代绒织物》,也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讲台上作过一次演讲。回国之后,因为工作较忙,而且我的大量实践依然集中在丝绸之路的早期织物上,所以没有时间来整理在安大略博物馆获得的资料。但我对绒织物的兴趣依然保留,自1999年以来,我在定陵博物馆同行的支持下,曾仔细地分析过定陵出土的双面绒织物;在苏州博物馆的支持下,分析了王锡爵忠静冠上的黑色素绒;我也特别注意收集天鹅绒的实物或标本,如元代绒缘帽子的实物,清代多彩经绒、多彩纬绒、妆花绒等,使我对天鹅绒的大部分种类有了实物的分析。另外,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王晨和南京云锦研究所好友戴健的协助下,我又调研了苏州、南京、丹阳等地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使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技术材料。因此,本文的写成,确实也与他们的协助分不开。

事实上,随着中国对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漳绒和漳缎已经被纺织史学者所重视。由钱小萍主持编写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卷》中有较为详细的对绒织机和织造技术的调研,而且载有详细的机械和上机图,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对绒织物传统工艺进行的调研,其中王晨、曾水法和钱小萍做了大量的工作〔1〕。进入21世纪之后,漳绒和漳缎先后被列入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阳成为漳绒技艺的

〔1〕 钱小萍主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曾水法执笔第六章第八节《漳缎织机及其织造技术》,第132~147页;王晨执笔第十八章第一节《漳缎》,第417~421页,第二节《漳绒》,第422~423页;钱小萍执笔第十八章第三节《天鹅绒》,第424~431页。

传承地,而苏州成为漳缎技艺的传承地。在南京这一云锦生产的故地,传统艺人又为故宫成功复制了具有高难度工艺的乾隆时期的妆花绒。近年在苏州,漳缎的研究与保护也已经正式启动。我相信,我们对中国天鹅绒的研究,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中国传统丝织品中的天鹅绒会在今天的生产中重放异彩。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天鹅绒的历史

绒之名 • 2

从绒圈锦到怯绵里 • 8

明代前后绒织物的生产 • 14

清代前后漳绒漳缎的生产 • 20

第二章 天鹅绒的种类

素绒(素剪绒) • 27

双面绒 • 29

雕花绒 • 30

绒缎(漳缎) • 31

彩经绒 • 34

彩纬绒 • 36

彩经彩纬绒 • 39

第三章 绒的生产技术

漳绒织造技术 • 40

漳缎织造技术 • 51

妆花天鹅绒织造技术 • 58

第四章 天鹅绒的图案

天鹅绒图案的题材 • 62

天鹅绒图案的排列 • 81

第五章 绒织物的应用

元明早期的天鹅绒 • 95

清代雕花天鹅绒(漳绒) • 104

清代漳缎和绒缎 • 116

特殊种类的天鹅绒 • 130

后记 • 134

第一章

天鹅绒的历史

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简称 CIETA)给起绒织物下的定义是:织物上除了地经地纬交织外,还有一组附加的绒经专门产生直立的绒圈,这些绒圈通常会被割断以形成短而密集的绒毛遮掩地经地纬,任何采用或局部采用这类组织的织物均可称为绒类织物^[1]。根据这一定义,实物中的栽绒织物和拉绒织物等均不能称为绒织物,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绒圈锦也因为没有专门的绒经而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中国古代与绒类织物相关的名称有漳绒(图 1-1)、漳缎(图 1-2)、天鹅绒、建绒、倭缎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漳绒、漳缎和天鹅绒。但人们对这三个名称的解释其实多有不同。在现代织物分类中,漳绒和天鹅绒一般是指素织绒,即先织造再进行全部或局部割绒的织物;漳缎总是指先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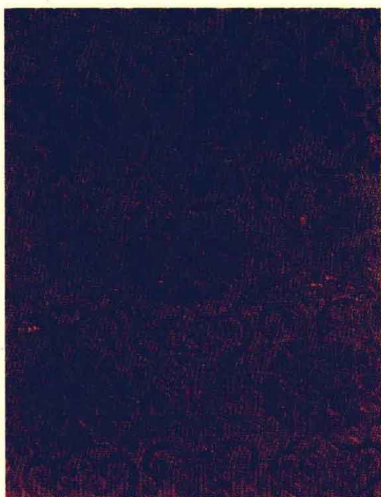


图 1-1 漳绒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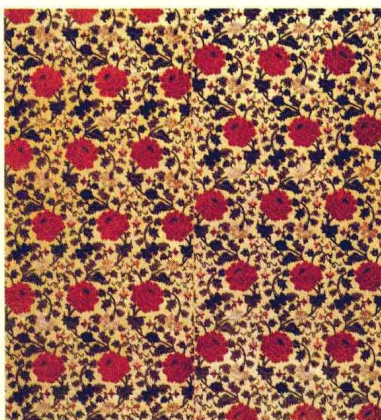


图 1-2 漳缎图例

[1] Vocabulary of Technical Terms, Fabrics, Publications de CIETA, Lyon, 2006, p40.



图 1-3 漳绒局部图

提花织造,再进行割绒的织物。(图 1-3)但从明清时期的织物名物对照来看,漳绒是指全割或雕花的素织绒,漳缎是指各种提花织造之后割绒的提花绒,而天鹅绒则可以同时指两种,正与西方所称的 velvet 的范围相同。本书也正因此而沿用天鹅绒之名,将其作为中国古代起绒织物的总称。

绒 之 名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想要判断某一记载中的“绒”是否为真正的起绒织物并非易事。绒有时可作“绒毛”解,如鸭绒、羊绒、驼绒等;有时可作“散丝”解,如绒丝、绒纬、绒线等;有时可作“织物”解,但可以是一种表面有茸毛的细软的布,也可以是经拉毛处理后的织物。如此广义的绒织物概念使我们要在史料中区别真正的绒类织物变得较为困难。但是,在浩瀚的史料中,我们还是可以将较为准确的、指称可能性较大的绒类织物记载找出来。

关于中国古代的绒织物之名,赵承泽在其《关于我国古代起绒丝

织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有过较为详细的探讨〔1〕。文中提到在《众经音义》和《集韵》等字书中的“緝”、《急就篇》中的“絺”等,都有可能对早期起绒织物的称呼。不过,较为明确的起绒织物名称应该出现在元明清三代,包铭新在其《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2〕。此外,日本学者吉田雅子也在其《中国绒的形成:基于地方志上用语变迁的研究》〔3〕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现将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与绒织物相关的名称记载一并列举如下。

怯绵里

中国史料中最早的关于绒类织物的可靠记载应该是《元史·舆服志》中的怯绵里:天子质孙,冬服有十一等,第一等为纳石失,第二等就是怯绵里;百官质孙凡九等,第一等是大红质孙,第二等是也大红怯绵里。怯绵里在《元史》中自注为“剪茸”,此处的“茸”与“绒”不同,只能作“绒毛”解释,而不可能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绒毛织成的织物,或是拉毛而成的类绒织物。如单从“剪绒”两字来看,除真正的绒类织物外,只有栽绒毯才需要剪绒,而以栽绒毯之厚,不可能用于做服装。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怯绵里最有可能是真正的绒类织物。(《大元毡毯工物记》中论及回民剪绒毡,一般用于做毡毯,不能用于裁衣。)

“怯绵里”一词来源尚无人考证,有人推测为波斯语音译,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深入研究,元代所有史料中除上述一条以外再无它处述及。

〔1〕 赵承泽:《关于我国古代起绒丝织物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技术史组主编《科技史文集》(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86~92页。

〔2〕 包铭新:《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丝绸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21~29页。

〔3〕 吉田雅子:《中国におけるベルベットの形成——地方志等における用語の变迁を通して》,帝冢山短期大学织物文化研究会会志《はた》1998年第5号,第35~47页。

剪绒

剪绒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称。《元史》中对“怯绵里”作注时用的词就是“剪茸(绒)”。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周宪王朱有敦家有一老佣人,年七十岁,原为元代皇后乳母之女,常居宫中,能通胡语,知元宫事甚多。朱有敦常向其仔细询问宫中史实,并于永乐四年(1406)据此写成《元宫词》一百章,其中第十四章云:“清宁殿里见元勋,侍坐茶余到日曛。旋着内宫开宝藏,剪绒段子御前分。”这里的“剪绒段子”应该就是剪茸怯绵里,它平日被当做珍品藏于左藏库,专用于赏赐。这种剪绒后来也被人们看成是西方的产品。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卷八:“西洋剪绒单,出西番,绒布织者,其红绿色,年远日晒,永不退色,紧而且细,织大小番犬形,方而不长。”这里的“剪绒单”可能就是剪绒段子,能织出红绿色的动物纹样,明显是提花绒织物。

明代罗贯中的小说《水浒传》第七十六回中提及有“剪绒战袄蔡舞”。《天水冰山录》中载录了当时剪绒应用的清单有:大红、青绿、沉香各色剪绒段二八匹,青素剪绒十六匹,红剪绒獬豸女披风一件等。甘熙《白下琐言》卷八:“剪绒则在孝陵卫,其盛与绸缎埒。”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十三:“剪绒随织随剪,其法颇秘,广州织工不过十余人能之。”范端昂于文中写明了剪绒方法,随织随剪就是将素织绒中的平绒全剪成绒毛,没有图案。

天鹅绒

天鹅绒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人策彦周良的《入明记》中。该书收录了自永乐元年至天顺八年(1403—1464)若干年间的明朝赠赐日本国礼品清单,其中与绒相关的名称有四类:一类是绒锦,第二类是绒绣,第三类称织绒,还有一类就直接称为“天鹅绒”。提到天鹅绒的记载共有两条,分别在永乐四年(1406)和永乐五年(1407),均是白天鹅

绒纒丝觉衣,这是我们所知最早称为天鹅绒的两例记载,所指为起绒织物无疑。而且,从“天鹅绒纒丝”将天鹅绒和纒丝连用来看,这类天鹅绒应该是以缎纹地上起绒的织物,说明天鹅绒在当时应该包括提花绒织物。

一般叙述天鹅绒历史引用文献较多的是《天水冰山录》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天水冰山录》是记载嘉靖年间(1522—1566)严嵩抄家所获的清单,其中丝绸品种甚多,有织金、妆花、织花和抹绒等种类,数量巨大,都有几百匹之多。特别是书中还提到了“天鹅绒头围”一项,应该是真正的绒织物。沈德符(1578—1642)是明代晚期的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万历野获编》卷十二中“士大夫华整”条载:“江陵时,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江陵即万历时著名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那么,这条史料所记当是在万历初张居正任相时天鹅绒的使用情况。

在明清史料中,天鹅绒一词比漳绒或漳缎出现得早。在正德八年(1513)《大明漳州府志》和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的“物产”条中,并无漳绒记载,但到崇祯元年(1628)《漳州府志》“物产”条“帛之属”中,出现了“天鹅绒”一词〔1〕,当确指绒织物无疑。另一部万历四十年(1612)《泉州府志》物产项中则记载:“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2〕

倭缎

“倭缎”一词最早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倭缎,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

〔1〕 袁业泗修:崇祯《漳州府志》卷三十八。

〔2〕 阳思谦修:万历《泉州府志》卷三。